

# 郑永年：当代“复古”与“五四运动”再反思

2019年4月30日 3:30 AM 文/郑永年 来自/联合早报



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北京鲁迅博物馆在北大红楼主办“五四现场”展览。（中新社）

今年迎来了“五四运动”100周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降，人们一改以往每年都会高调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做法，不仅越来越“低调”，而且在学术和政策领域出现一股不小不弱的否定这场运动的取向。

从政治上说，这种微妙的变化不难理解。无论是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正是“五四运动”使得两大政党成为了革命性政党，所不同的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革命性，这也决定了日后两党的命运。“五四运动”触发了中国的革命，但革命之后，政党就必然需要作出调整，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作为革命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持有不同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在低调对待、甚至否定“五四运动”的同时，就出现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复古”的社会现象。这也可以理解成为“否定之否定”。“五四运动”的主题是通过否定“传统”而追求方方面面启蒙和现代化。1980年代在知识界所发生的被视为是另一场“五四新启蒙运动”。因为这场新启蒙运动很快导向了青年学生和知识界的政治激进化，运动之后有关“五四”的话题便变得具有敏感性。1990年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意识形态便转向了保守，各方都力图从传统中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资源。这便是复古式“国学”崛起的大背景。

从对《论语》的现代式解读开始，中国很快进入了一个国学“复兴”阶段。这些年来，所谓的“国学”复兴令人眼花缭乱。适龄学童进入了形式多样的国学班（“读经班”）、妇女进入了“女德班”、教师重返各式“古装”、博士开始用古语答辩、一些党员干部（不乏高级干部）出现各种形式的“妻妾成群”……各种现象层出不穷，不一而足。

这些大多发生在城市，还算包装得不错了，至少有些“知识”的含量。如果到广大的农村去看看，那里的情况更显得触目惊心。各种邪教横行，只要有些钱的人，或者有点“忽悠”能力的，随便可以支撑起一个“庙堂”，进行自己的“传教”或者“讲经”工作。正式的社会秩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便是各种非正式社会秩序。

## “复古”风潮要回归什么

形形色色的当代复古是商业噱头？是在寻找精神寄托？还是在进行文明复兴？人们寻找着各种理由来论证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不过，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假象，就其本质而言，各种现象仅仅表明了中国一些人日渐堕落的精神世界，而堕落的精神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便是机会，无论是追求商业利益还是社会名望。

当然，即使是精神世界的堕落也不难理解。其起源在于当代社会急剧转型期间的行为失范。旧的规范不行了，就需要新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寄托。中国数千年是农业社会，现在面临一次真正的并且异常彻底的商业革命。商业社会就需要符合这个社会的另一形态的行为准则和精神依托。历史上，西方也同样几次经历了这个过程，尼采的“上帝之死”近代命题就具有类似的背景。对中国来说，问题在于要塑造什么样的精神和如何塑造这种精神？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今天盛行的这些大概都会被视为是“牛鬼蛇神”。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不过追求不切实际的理想就变成了乌托邦主义。不管怎样，毛泽东这一代是“五四运动”的产物，他们具有近代以来的鲜明的“文明”与“野蛮”、“先进”和“落后”的观念，只不过是在当时被“革命”与“反动”的话语所取代。正是因为这些被视为是“野蛮”“落后”和“反动”的，它们才被一一清除，至少就形式而言。

不过，现在这些现象又一一出现了，返回中国社会的舞台。问题在于，“五四运动”之后的种种清除被视为是“野蛮”和“落后”的行为都做错了吗？“五四运动”以降到“文化大革命”，一直被视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时期。的确，在清除上述社会行为的同时，很多被视为是“中国传统价值”的东西也荡然无存。

不过，在当代全面“复古”的社会运动中，所有这些从前被政治扫荡的“糟粕”都回来了，而被视为是积极的“中国传统价值”并没有出现回归的迹象。因此，今天的问题是：需要继续对“五四运动”做全面否定吗？这场运动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呢？对所有这些问题人们并不很清楚。

“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开放政治，与传统封闭政治相对；科学是理性，与传统的迷信相对。为了一些政治原因而否定“五四运动”，并无道理。从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的大部分是做对的。

“五四运动”开始时的“新文化运动”，犹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具有非常的先进性。只是后来受内外政治环境的影响，其主题演变成为政治运动。尽管这种转变是历史的

遗憾，但也是必然的。但有什么理由否定“新文化运动”呢？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场“新文化运动”，中国仍然会生活在何种社会情形之下呢？

知识界是新精神世界的主要来源，但可惜的是知识界率先堕落。“五四运动”之后西方各种思潮进入中国，在中国竞争思想空间。1949年之后，马克思主义则变成了唯一的方法论。改革开放之后，一波又一波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到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西方的文化或者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那些从前被视为是“牛鬼蛇神”的东西就成为了科学呢？显然不是。

1980年代之后盛行在中国的西方思想，产生了两个相关层面的问题。在政治上，各种西方思想的竞争产生了消极后果。如同近代，一些人仍然相信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因此西方所有的，中国也必须有，包括思想和制度。这种把“现代化”和“西方化”的简单等同，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情形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另一方面，在学术上，这些“进口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这是当代中国话语权空白的一个重要根源。西方的不能解释自己，而自己又没有原创，这必然造成话语权的缺失。不过应当说明的是，至少西方学说本身是“自足”的，因为有其自身的一套逻辑；西方学说是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能够解释西方的实践。只不过是当人们把这套逻辑机械地套用到中国经验的时候，就显得苍白无力。

这也是这些年来中国一些人开始追求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背景。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努力的本意，但对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人们从来就没有任何有效的争论。急于求成，为数不少的学者就拼命地回到了传统，因此，“易经”“风水”“术数”“密码”……一一出来，登上了知识的最高殿堂，充斥着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用来解释各种社会现象。结果，制造出大量的自说自话、谁也看不懂的东西，毒害着年轻人和未来。

## 中共执政最大的文化挑战

今天的中国学界，抵制西方已经成为各方“有意识”的努力，并且因为很多西方思想在中国缺失社会根基，浮于表面。在很大程度上，诸多被视为是来自“西方化”的压力，实际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现代化。或者说，凡是现代化的国家都会经历类似的社会变迁。

无论是面对西方还是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压力，“复古”是解决方案吗？“复古”被普遍接受，造成了一种“凡是传统的就是正确的”概念。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加以纠正，这样下去会导致怎样的结局呢？一句话：和世界脱轨。

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第一、中国中产阶级仍然偏低，穷人仍然居多，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人仍然是少数，尤其是农村地区。第二、中国缺少很多国家所具有的“国家宗教”，各种民间宗教一直泛滥成灾，并且层出不穷，源源不绝。第三、中国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道德哲学，缺失理性分析文化。强调道德过度，

经常走向反面，变得极度虚伪，知识人的堕落经常变得毫无底线。第四、中国没有经历过类似欧洲那样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政治启蒙过度。如上所说，“新文化运动”类似于文艺复兴，但时间过短，很快演变成为单纯的政治启蒙运动。第五、当代社交媒体泛滥，各种庸俗的东西总是能够得到最有效的传播。

一方面是抵制西方，另一方面是“复古”，两者的结合使得和世界的“脱轨”变得容易。“脱轨”现象是显见的，表现在方方面面。这些年来，迅速上升的“义和团精神”就是一例。很多人，总觉得国家现在实在太了不起了，变得“天不怕、地不怕”和“刀枪不入”了。但问题在于，世界在变化，并且是在加速度地变化。如果这种“义和团精神”横行起来，国家的衰落是必然的。“落后会被挨打”，这是近代以来给中国的最深刻的教训。正是这一教训促成了 1980 年代开始的开放政策，正是开放政策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强大。现在，国家好不容易强大起来了，但可惜的是又开始“复古”了。不过，很显然，“复古”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文明复兴”。

怎么办？东亚“儒家文化圈”的经验可以参考，因为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并且历史上曾经一直是这个文化圈的主体。日本近代的“脱亚入欧”运动类似于中国的“五四运动”，并不比中国少激进，日本获得了成功。之后，亚洲“四小龙”也获得了成功。成功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层面的，更是文化层面的。所有这些社会都承继了传统文化价值，但没有出现这里所说的“复古”现象。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社会被视为是比较“西化”的，但传统文化价值也同样并没有因为“西化”而消失。这些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传统价值的有机结合？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不难理解，如何实现文明复兴而非“复古”，已经成为中共作为执政党的最大文化挑战。对执政党来说，在这个领域，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从革命政党向执政党转型之后，难道不需要革命时期所具有的“革命性”了吗？如何根据新的形势和环境来重新界定执政党的“革命性”？如何维持这种“革命性”？对所有这些，执政党没有明显的答案。

尽管执政党对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经验地看，失去“革命性”的结果是显然的。“复古”现象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其中不乏高级干部。“迷信”“求神拜佛”、信仰和参与各种邪教等等绝非只是普通民众，而是流行于执政党，其中更不乏高级干部。看来，一场新的文化运动势在必行，这场运动既非“复古”，也非“西化”，更非拒绝现代化。它是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政情**

**特稿：奠基五四 中国腾飞**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的“五四现场”展览，23日在北大红楼开幕。展览通过百余文物资料、照片和绘画作品，“重现”当时情景。作为五四运动最重要见证地的北大红楼，恰逢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今年以来一直处于客流超限状态。（中新社）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0多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金水桥前，随后一路高呼口号游行到东交民巷，试图进入外国驻华使馆区，遭阻拦后又前往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痛打了还未来得及逃走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放火烧了赵家楼。这一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日子之一，史称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至今已过百年，中国也经历了三大历史时期，但五四运动从没有被遗忘，它的意义和精神也在不断被总结，被赋予新内涵，长盛不衰，历久弥新。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作为一战的胜利方，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势力范围，但和会不仅拒绝中国代表的要求，还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中国北洋政府迫于列强压力，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3日晚，获知北洋政府将签署巴黎和约的北京大学学生紧急举行学生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高校也派代表参加。大会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包括联合各界一致力争，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第二天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北大学生、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后来的著名学者、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被推举为游行总指挥。

在第二天的游行示威中，学生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被认为是“卖国贼”的曹汝霖、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輿。游行示威最后以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以及32名学生遭军警逮捕告终。

## 狭义与广义五四运动

北京学生上演的五四抗争很快传到各地，上海、天津、长沙、广州、南京等地的学生也纷纷成立团体。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地发出罢课宣言。多个城市学生响应罢课。

面对突如其来的学潮，北洋政府一度尝试采取怀柔政策，释放了五四当天被拘押的学生，但随着学潮不断升级蔓延，当局又采取镇压手段。1919年6月4日，当局逮捕了800多名学生，引发新一轮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也从罢课扩展到罢工、罢市，并蔓延到全中国100多个城市。

1919年6月10日，内斗不断的北洋政府在强大社会压力下，宣布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但学生和各界人士继续抗争，阻止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学生的胜利而结束。

1919年五六月份发生的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救国图强的政治运动，即狭义的五四运动。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五四运动的爆发离不开此前数年新文化运动的滋养，五四运动的影响也绝非限于惩办几个“卖国贼”，以及中国代表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短期政治目标，它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也是新文化运动传播与发展的助推器，对近代和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广义的五四运动包括从1915年至1920年代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也叫五四时期。在五四运动中，学生们高呼的口号大多是当时的政治诉求，而五四时期涌现了许多新理念，包括思想解放、平等自由、爱国图强等等，但最响亮、最持久的口号还是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念和口号仍是激励中国社会进步的精神源泉。

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对传统求解放。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蔡元培、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大力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反对旧道德、反对文言文、反对专制、反对迷信，主张向欧美学习，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学习。他们的“鼓与呼”深刻影响了当时的青年和舆论，迎来中国思想文化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第一个高峰。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精髓。1915年9月，陈独秀在标志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向社会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生动地按照外语发音将民主与科学称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强调“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 中共推崇五四运动

除了严重冲击传统的道德秩序和思想文化外，广义的五四运动也催生了中国政治新格局，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也是中共主要创始人。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刘仁静因参加五四游行而遭当局逮捕；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也在五四时期表现活跃。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五四运动为中共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作为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毛泽东一向对五四运动情有独钟，高度评价。他不仅在中共影响力扩大后把五四定为中国青年的节日，还把五四运动标定为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的分水岭，强调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 20 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 80 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

毛泽东还说：“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两个潮流。一部分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正面影响，是毛泽东推崇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在实践中，毛泽东强调的是五四运动的革命功能和造反精神，而不是“德先生”“赛先生”。即使在 1949 年中共建国后，毛泽东的革命热情也未稍减，直到 1960 年代中期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鼓动红卫兵像五四青年那样起来造反、大破“四旧”，将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横扫，结果让中国陷入长达 10 年的内乱。

## 五四“逢十”纪念高规格

1978 年底中共开始改革开放后，官方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出现一些改变，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不再将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水岭，而将这个分水岭推迟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同时，随着中共努力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官方不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强调五四运动的造反和抗争意义，尤其在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虽然五四仍是青年的节日，但五四运动中学生游行示威、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等事迹很少在官媒中出现，五四纪念活动规模和内容也都有了更严格规范。

不过，中国官方依然强调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并在五四运动“逢十”周年时举行高规格纪念大会。1989 年五四运动 70 周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发表讲话；

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讲话；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时任中共政治常委李长春发表讲话。

据了解，中国官方将在今年4月底举行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可能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 习近平三个加强纪念五四

4月19日，中共中央专门就五四运动举行集体学习。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这次集体学习是要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

## “三个加强”

习近平将五四运动定性为“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他强调，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引导人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要加强对中国青年运动的研究，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中共的领导，听中共的话、跟中共走。

新华网等官媒报道称，习近平讲话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青年要在新时代进一步赓续传承五四精神，在中共领导下，向着民族复兴伟大梦想不懈奋斗。

## 传承五四精神 阐明新评价新目标

习近平有关五四运动的讲话和官媒的解读，基本阐明了中国官方对五四运动的新评价和发扬五四精神的新目标。

不过，在经济和利益至上的当下，百年前那些仁人志士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唤已显得十分遥远。对很多人来说，纪念五四运动似乎只是官样文章，与忙于挣钱的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何况，中国早已告别了贫穷落后、民族危亡的年代，当今青年基本没有物质匮乏、忧国忧民的经历，很难理解先辈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激昂与悲壮。

但物质利益不可能是公众追求的唯一目标，任何社会都不能缺少精神支撑。以民主科学、思想解放为核心的五四精神不仅是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更具有无可取代的现实与普世意义。这正是人们纪念五四运动、传承五四精神的价值所在。

## 五四后中国经历三大时期



➤ **第一个时期：1919年至1949年**

在连绵战乱、政权几经更迭之后，中共打下江山，成为执政党；

➤ **第二个时期：1949年至1978年**

中国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晚年时登上“万寿无疆”的神坛；

➤ **第三个时期：1979年至现在**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腾飞，“中国崛起”成为全球话题。